

版权登记图字：01-1998-224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风建筑/ (德) 汉斯·埃里希·库巴赫 (Kubach, H. E.) 著; 汪丽君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世界建筑史丛书)

ISBN 7-112-03736-0

I. 罗… II. ①汉… ②汪… III. ①罗马风式建筑史 ②建筑物, 罗马风式—简介 IV. TU-09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0998 号

© Copyright 1978 by Electa S. p. A., Mila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by Electa S. p. A., Milan.

本书经意大利 Electa S. p. A. 出版公司正式授权本社在中国出版发行中文版
Romanesque Architecture, History of World Architecture/Hans Erich Kubach

责任编辑 董苏华 张惠珍

世界建筑史丛书

罗马风建筑

[德] 汉斯·埃里希·库巴赫 著

汪丽君 舒平 姜芃 邱滨 译

周湘虎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2 印张: 19 1/2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ISBN 7-112-03736-0

TU·2881 (902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世界建筑史丛书

罗马风建筑

[德] 汉斯·埃里希·库巴赫 著
汪丽君 舒平 姜芃 邱滨 译
周湘虎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本书追溯了整个罗马风建筑的发展，不仅对宏伟壮丽的宗教建筑予以关注，而且还涉及到军事和民用建筑，并用一章来介绍材料、结构方法和装饰等内容。

目 录

作者的话	4
绪 言	5
第一章 前罗马风建筑	9
第二章 早期罗马风建筑	33
第三章 盛期罗马风建筑	79
第一节 拱顶巴西利卡	81
第二节 平顶巴西利卡	94
第三节 欧洲西南部的成熟形制	106
第四章 晚期罗马风建筑	127
第一节 欧洲中心地带	129
第二节 晚期罗马风建筑——早期哥特式简单拱顶巴西利卡 和平顶室内	144
第三节 大厅式教堂和正厅式教堂	164
第四节 集中式平面教堂	182
第五章 民用与军事建筑	183
第六章 教堂建筑与环境	191
第一节 教堂建筑的技术要素	193
第二节 教堂建筑和艺术品	197
参考文献	199
英汉名词对照	209
照片来源	230
译后记	231

作者的话

本书是近 50 年来，对欧洲所有可能受罗马风样式影响的国家，进行大量深入考察研究的成果结晶，为此，很多情况下，表达了作者自身的正统观念——无疑不同于某些通常已被接受的学术观点，同时对有关罗马风建筑复杂性的简单阐述和区分，坦率地提出质疑。

非常遗憾，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为此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本包罗万象的手册，因此如果英文译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应主要感谢译者罗伯特·埃里希·沃尔夫博士以及罗纳德·米伦的协助。

汉斯·埃里希·库巴赫

今日在欧洲依然存留着数以万计的罗马风建筑。其中大量的大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尽管其外观有所变化,但其罗马风的特征依然存在。各种印记和遗迹随着考古发掘终于显露于世,而且早期的文字记载也不断地告诉我们越来越多的有关这类建筑的情况。由于分布密度不同,罗马风建筑主要分布在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爱尔兰和苏格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部;中欧的东部——斯拉夫大陆西部,即从波兰起穿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到斯洛伐克;匈牙利的西部和斯洛文尼亚,及南欧的意大利半岛及附属岛屿也发现了存留的罗马风建筑。简言之,罗马风建筑的分布几乎囊括了所有希腊语系和罗马语系的民族区域,以及斯拉夫西部和一些其他民族后裔的生存地——这恰是中世纪罗马教堂分布的区域。

从历史上看,罗马风建筑是由许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共同创造的;其核心就是意大利的古罗马帝国及其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扩展区域。如果说它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优势地位因阿拉伯人公元711年的入侵而大大减弱的话,那么欧洲北部和东部地区重新赢得基督世界也可算是一种补偿。

根据现代地理学的定义,罗马风式样建筑的中心位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北部以及德语国家的西部和南部,不列颠岛,意大利以及它们相邻的地区——即那些曾属于古罗马帝国统治的区域。此外,还可以在古罗马帝国的北部和东部加上一个带状区域,但那里相对来说罗马风建筑的分布较少。

在公元4—5世纪,随着当时几乎所有社会体系的崩溃,导致了希腊人向其西部和南部迁移,并在那里重新构筑起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在中世纪的早期和中期,人们对世界、生活、精神和艺术的看法主要受基督教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随着传统文化的衰败以及对基督教信仰程度的减少,传统建筑艺术的影响在许多区域逐渐降低。然而在欧洲的一些地方与之不同的是,世代居住在这些城镇和乡村中心的人们生活观念,不仅同古代社会遥相呼应,而且其生活环境的面貌仍清晰地显露出古代传统的一些特征。那里的教堂和一些其他建筑无论大小,不仅保持了它们的传统精神,而且成为联系现代生活同古代社会渊源的一种模式。因此,中世纪的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只被保存在博

物馆中的文化遗产,而且还应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活跃部分。中世纪建筑艺术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现象(在目前我们对它的研究中,将利用特殊的一个章节总体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中古城市、城堡和建筑)。就像希腊建筑被发现了它同寺庙的唯一联系一样,中世纪建筑也被发现了其同基督教堂密不可分的关联。正是建造教堂的精确性才最充分地显示出中古时期人们的创造力价值,并通过建筑这一形式来体现当时思想文化、艺术、技术和手工艺的最高境界。

然而,宗教建筑并非从虚空中产生,对德国和斯拉夫的史前及古代木建筑和地中海地区古代石建筑的研究长期存在着不同观念的争论。罗马风建筑的很多典型特征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原型:在古罗马建筑中常见的拱和连拱券(既包括开敞的也包括封闭的),以及穹隆、筒形拱和更为复杂的筒形拱相贯而成的十字拱。拱和筒形拱可以溯源到萨珊建筑,公元6世纪时,在拜占庭、美洲以及小亚细亚的建筑中也经常使用拱和穹顶。在埃及、克里特岛和希腊都广泛流行使用整块石料或小块石料叠砌的柱子。其最下端(柱脚)构成了所谓的雅典式柱基,其柱头可设计成爱奥尼、科林斯或复合式柱式。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柱式在古希腊大量存在,并最终延续到古罗马帝国时代。在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巴西利卡中和教堂前厅里可以发现成列的柱子支撑着拱券(或额枋)。多层重叠柱式既可用于舞台背景,也可用于圆形露天剧场的外部形态以及城市大门,这些形式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

在埃及古王国的很多大型建筑中已经使用方形石块砌筑,至于砖砌建筑则是在近东早期文化时期及古罗马时期出现。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了解所有这些式样和技术是如何传到西方中世纪时代的。当然,在古罗马帝国也可以找到一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巴西利卡,这是在基督教堂中十分流行的式样。其内部空间组成包括——中厅、耳堂、半圆形后殿、三重唱诗台以及纵向长廊等等。其他平面形式如:希腊十字式平面、带壁龛的八角式平面以及带回廊的圆形平面,也是按以上空间秩序安排的。其他更为复杂的不同形式是带中央穹顶的教堂建筑,出现在小亚细亚、美洲、拜占庭(即所谓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查士丁尼建筑体系)和意大利(米兰的圣劳伦佐·马焦尔大教堂)。后期的教堂如圣阿奎利诺八角礼拜堂,通过内外都朝东的双层重叠回廊来展示其双层墙。这一形式成为11—12世纪某些地区典型的建

筑式样。就像飞扶壁体系一样,传统的双塔正立面形式的存在已经在叙利亚得到证实。

我们没有理由惊讶从公元前3000年以来,地中海地区的国家长期积淀的建筑外部样式和类型对罗马风建筑带来的影响。然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如此有限的选择却造就了如此意义深刻的影响。

就总体而言,可以说无论是在埃及的基督教堂,还是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美洲甚至是拜占庭的教堂都或多或少对西方有一定影响,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直接的模仿或是一定程度的发展。根据最近的研究,几乎所有我们知道的有关罗马风建筑的情况都被证实是一种新的创造,它利用和改变着来自各方的灵感。最显著的就是带柱脚和柱头的柱子以及带柱廊的巴西利卡。一旦研究的兴趣集中到这些建筑特殊的形式和平面上(在意大利留存广泛),将产生不可避免的强烈印象——那就是中世纪建筑对于古代晚期和基督教早期建筑来说,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继承,虽然伴随着有一些低劣的实施和错误的模仿。然而,自从我们不仅熟知中世纪艺术的全部价值,而且还在评价它的美学特征以来,我们的判断随着这一印象的加深被逐渐地改变了。甚至是当我们把它与同时代平行发展的其他教堂建筑相比:如美洲、俄国——值得注意的是基辅、苏兹达尔、诺夫哥罗德——我们经常发现会有一些惊人的但又不多见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它们之间是否有明确的联系。

仅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即使有充分证据证明罗马风式样同其前期建筑形式相关,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一个巴西利卡不一定等同于其他。差异有可能被对事实错误的解释所隐藏:早期基督教的巴西利卡不应被解释为与11、12世纪罗马风教堂采用了同样的形式。与后者不同,4、5、6世纪的大型建筑并不是严格的封闭式空间形态,而在其两侧有密实的窗间墙及围墙。这更像是在两道墙体之间营造一个非确定的中介空间,整体上构成了一种模糊形态,仿佛是被置于众多成组的纤细的柱子之上,与镶嵌其表面上晶莹闪烁的饰品共同营造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光洁、闪亮的大理石则像是在默默地延续着这种环境氛围,其开敞顶部的倾斜顶棚由木结构支撑。尽管早期的基督教堂和罗马风巴西利卡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即三个正厅空间由列柱分隔划分而成,中部厅位置显要且设有窗户,有些教堂以一个半圆形穹顶

后殿作为结束空间——但这些仍不足以使我们确信它们的相近。尽管在公元753年拜占庭与罗马教会分裂,但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之间依然存在着联系。甚至在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之后,朝圣者们依然坚持从陆路或水路去朝拜巴勒斯坦圣地。经济的纽带不仅通过政治、历史,而且通过纺织品贸易的艺术交流得到证实。最终,当这些联系被11、12世纪十字军东征所加强时,欧洲人才逐渐认识到:不仅是东伊斯兰建筑,还包括一些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古代文化,都要比欧洲传统文化古老。我们谈论的多是西方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力,以至于我们难以发现它比遥远的回应或人为的曲解更多的与东方具体而确定的联系:西方集中式平面教堂源于传说中的耶路撒冷教堂和基督圣墓,就是这样一种误解。

以现代的观点看,当古罗马城的大型建筑被用以适应中世纪的功能需求时,这种同古代原型的联系本应更加紧密。4世纪初期特里尔(Trier)的波尔塔·尼格拉教堂(Porta Nigra)(今天位于德国的西南部)就是一个富有启示的例子,在古罗马时代它曾是城市的北部门户,是一个由成列的柱式、柱上楣、厚墙中开洞形成的连廊和拱顶构成的多层建筑,在11—12世纪时被改造成一个教堂。大约在公元1150年,添加的半圆祭祀席后殿则明显采用了不同于古罗马城门的手法:即没有采用水平的层线,而是通过扶壁柱来强调垂直的内聚力;很多建筑构件不再采用圆形断面而采用方形。当环绕屋顶的矮廊发展成为一条走廊时,可以想像它同古罗马带护栏的屋顶走道是一种相似的现象,这也许只有通过建筑历史学家的抽象分析研究才能得到证实。因此,无论是外表还是结构上,古罗马城建筑的真实古代原型意义在中世纪已不存在了。

在中世纪期间,源于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在神圣罗马帝国随处可见(时至今日的一些区域)。然而正如我们所设想,它们的影响相当有限。同样,来自另一个重要文化领域——伊斯兰建筑的影响也仅是表层的。同基督教堂一样,内部空间是清真寺的主要功能部分。就两者相比较而言,清真寺的内部空间表现的是幽渺深远,迷离徜恍的气氛;而所有西方的建筑空间都相对有着严格、清晰的划分限定,包括内部与外部、结构与空间。事实上中世纪来自伊斯兰的影响主要被限定在建筑外部的一些孤立形态上,例如二心拱和马蹄拱,开槽拱和密肋星形拱顶——尽管这些形态只是零星地出现。

如果忽视了中世纪的社会文化背景，那么就很难想像它那与古代截然不同的艺术和建筑。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古老的民族种群历久犹存的程度，而且这一状况在中世纪仍在延续。但在中世纪不同民族对罗马风艺术的作用这一问题上，却始终存在着争论。当很多研究学者把古代样式的改变仅仅看成是一种原始的倾向性时，他们深信在罗马风艺术中看到了凯尔特（Celtic）式或德国式的元素，其他人则在积极地证明这一点。但究竟凯尔特式、德国式或西斯拉夫式对创新这种新文化都贡献过哪些力量呢？浪漫的观念和民族主义的野心已经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很多误解，尤其是某些现代民族已经开始认为自己同史前或原始时期那些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称之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的人们相近。今天我们不能再坚持认定凯尔特式和法国式是不同的，也不必说盎格鲁—撒克逊式同英国式，条顿（Teutons）式同德国式是不同的，更不要说隆哥巴第（Longobards）式同伦巴第（Lombards）式了。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相当公平地反映不同民族的人民对中世纪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在高卢发现的史前石刻所反映的形态同11、12世纪罗马风式样有着很多共同之处。诺曼底的罗马风建筑和在英格兰被征服（公元1066年）后的罗马风建筑，强调以圆形要素连接的带特殊标记的垂直物，这一特征仅在诺曼底人的家乡——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构教堂中被发现。最近才认识到其早期的木构形式、开间以及集中式平面——都同罗马风教堂建筑相关——同时也在史前的世俗建筑中起着显著作用。

一、主教区和地方教区组织

正是在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时代（先罗马时代），教堂在国内的行政组织逐渐形成。普遍的教区及其中心的传播，使得主教们拥有一定的地位，并建立了相应的体制。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中世纪。一些地方是重新设立，另一些地方则是新建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到默兹山谷的主教区从通厄伦移到马斯特里赫特并最后到达列日。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南部，很多主教区教会已发展到中等规模，甚至一些小城镇从罗马时代和早期基督教时代起，就有了一些相当小的教区。另一方面，直到8—9世纪或更晚些时候有些地区才改变其信仰〔在圣博尼费斯（St. Boniface）传教士的努力下〕，主教管区覆盖了相当大的范围。这经常

反映在主教堂的巨大规模中，而这经常是由一些地位高的世俗统治者资助的结果。

在城镇和乡村中，对人们灵魂的关怀是通过一个密集的地区教会网络和教堂联盟来得以保障的，这同样在建筑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无论在哪里只要曾存在过一个教区，那么必然会建造一个教堂。

教堂与县郡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那些对教堂提供经济支持的人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特权。因此德国国王在选择主教时，对那些不在实际提名中的人有选择权——这种情况在11世纪的授爵权问题上招致了公开的反对。无以数计的大小封建领主都对领地的修道院和教区实施相似的权利。我们由此很容易推断出对教会当局如此的贡献和他们之间如此合法的依存必然会导致某些建筑上重要的差异，但这却很少得到证实并且经常导致错误的推论。

二、修士会

首先出现在欧洲东部的寺院体系有其宗教根源，即对6世纪宗教神学中传播的基督信仰的解释。就像神学和建筑学一样，寺院体系同样经历了西方大规模的变革，尽管除了它对我们的影响外，我们难以认识到它的这些变革。班尼狄克教派控制这一领域达几个世纪。当欧洲基督世界出现了成百上千的男子修道院和女子修道院，并逐渐形成众多的基督教信仰核心及文化学派时，寺院建筑严格的规范不觉中被削弱了，并导致持续的变革。那些11世纪对戈耳泽的Lotharingian本笃会修道院和克吕尼的勃艮第修道院产生影响的变革特别值得注意。这些有关教堂建筑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成为众多研究与争论的主题，但这种影响似乎经常被夸大，特别是在施派尔教区希尔绍的士瓦本修道院的变革尤为如此。

12世纪的普雷蒙特雷和锡托的修道院成为两大新教派的中心，普雷蒙特雷修士会和西多会建立了大量新的寺院中心并在整个欧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在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3世纪是以创建了圣方济会为标志的，这反映了哥特建筑的兴起——尽管某些早期圣方济会教堂同当地的晚期罗马风教堂在式样搭配上是非常和谐的，例如在科隆的圣马里安及施皮格尔教堂（Sankt Marien zum Spiegel）（已毁）和锡格河畔的塞林根瑟附近的前修道院教堂。

第一章 前罗马风建筑

一、国家和民族

中世纪还没有 19、20 世纪构想的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已成为众多课题的重点内容，对于本书也具有同样的价值。

艺术长期以来受人人为的控制，往往作为展示民族优越感的主要形式。这不仅是法西斯主义及纳粹主义的发明；在法国这种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形成民族实体的根源可能历史久远，然而在与我们的研究相关联的世纪中，神圣罗马帝国认为其对于众多领土而言是成功者并拥有统治权，但这只是一种相对的权益维护，甚至它从没有同时占领过整个罗马、德国和斯拉夫民族的领土。直至罗马风时代晚期，最大的封建领土——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王室领地（属王室的版图）和英格兰王国才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君主国。这些王国不断增加的重要性和其领土的扩张一起导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与倾斜。

艺术的历史也似乎公正地显示了相似的情况。综合的艺术中心与众多的小领土国一样清晰地彼此划分区界，并且那些中心也决不会在地理领土上相同。这进一步显示出更高层次上的关系，无论什么样的教会和国家实体，只要在地图上能找到的就决不会相同。

国家是以封建压迫和骑士制度为特征的，并都是等级秩序的表达。在罗马风时期也得到同样的体现，即使某些地区——诺曼底和莱茵河地区——12 世纪后也开始认识到城市自治权的重要性。大量密集的有设防城堡遍布整个大陆，其中有封建贵族的住所。在那里，他们治理领地和设立法庭，保护民众和抵御入侵，以及控制经济的发展。9 世纪末到 10 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对于诺曼人和匈牙利人的突袭，安全防护和抵御外敌的组织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封建统治扩张到西部的边界，以抵御伊斯兰教及来自东方的威胁，尽管各民族间还依然存在着长期的夙怨和战争。随着城市的不断膨胀，加强防卫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前罗马风”形式是一个近期才发明的术语，充其量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且，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定和难以解释的。在此，K·J·科南特提出了一个加洛林（先罗马式，公元 751 年加洛林王朝建筑式样）罗马风，并以此为依据把 8、9、10 世纪的建筑都归结在此标题下。就

我而言，并不想过分强调其消极的特殊一面——“还没有如此”——把它作为积极一面和向罗马风过渡的趋势。如果从一个综合艺术史的更广阔角度来看，前罗马风艺术的很多层面大体上，特别是在建筑上都可被当作是地中海盆地晚期古代艺术的最终表现。可以解释为只要我们认为这个发展的过程是最有效的，那么它最终发展成为罗马风自身。

二、前加洛林王朝时期

前罗马风时代可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如果以法兰克王国作为地理中心，那么第一个阶段可被称为前加洛林王朝时期或墨洛温王朝时期，因此必须记住这个时期开始于 5 世纪蛮族入侵结束后到 8 世纪中期。概括地说与伦巴第人统治的意大利、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德王国、现今的法国南部以及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统治不列颠岛的时期一致。

从前加洛林时代起，一些小型的石砌教堂仍然保存在西哥德王国统治的伊比利亚半岛部分，对于这些建筑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也可找到一些，尽管对它们的年代鉴定之所以会被接受，仅因为没有其他有效的建议选择（在任何情况下确定它们属于这个时期都是困难的）。除此之外，集中挖掘中世纪遗址，正为稳定增加这些教堂的数目增添一份光明。因为大部分的单厅式教堂都是石砌，而三厅式的教堂和居所则是木制的。可是毫无例外的，保留下来的只有它们的基础而没有墙体，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证实它们的平面却不能确定立面。除了在图纸上，没有一个遗址可以充分复原。

三、加洛林王朝时期

前罗马风时期的第二阶段是加洛林王朝时期，从公元 750—987 年几乎拥有一个半国家的统治权。从公元 768—814 年这段时期，尽管查理曼皇帝的领土从埃布罗河扩展到易北河，从北海扩展到意大利，但并没有集中对所有大帝国进行统治。帝国之后的公元 843 年发生了分裂，并在公元 871 年再次分裂，一个西法兰克王国形成了。一直到公元 987 年，名义上都是由加洛林王朝统治的。加洛林式是由撒克逊式建筑演化而来——通常又被称作奥托尼昂式，统治时期从公元 919 年至 1024 年。因此，正是在政治历史的基础上，法国的研究学者开始趋向于在公元 1000 年附近建立一条分割线，标注为早期罗马风的开始，也作为下

一个新的一千年的开始。鉴于看到德国在10和11世纪之间联系日渐紧密，最近把大部分11世纪的作品称作奥托尼昂式，或者像H·布施说的那样称为“前罗马风”。

这将再次限定成熟阶段的罗马风概念。就我个人而言，情愿宣称所有加洛林时代为前罗马风，从早期加洛林王朝到西法兰克王国的最后统治者，其末端等同于所谓10世纪中期的黑暗时代。因此早期罗马风应开始于10世纪晚期，并且由那些在晚期奥托尼昂（1024年）和舍拉一世（1024—1060年或1080年）统治时期所创作的作品组成。

我们主要是通过几个重要作品来认识加洛林时期的前罗马风式建筑。例如亚琛的法尔茨巴拉丁礼拜堂，威斯特伐利亚的科尔韦的前修道院教堂，以及坎帕尼亚的贝内文托省的圣索菲娅教堂，还有一些小巧而协调的建筑，例如米兰的圣萨蒂罗教堂、奥尔良附近的佩雷·杰米格涅的巴拉丁礼拜堂及黑森的洛尔施的本笃会修道院的门房；还有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不同形制的巴西利卡式建筑（以及莱茵河地区中部）；最后是大量的可能引起争论的一些建筑，存在着认识上的困难，或者仅知道它们的平面（这同任何确定的事实还相距甚远），或者不能确定年代和原有结构真实的环境以及它们怎样才能被复原。在此情况下相当数量被发掘建筑的基础就保持裸露，尤其在意大利教堂中，情况经常如此。

实际状态使对其特征的系统研究变得相当困难，我们可以去挑选出那些肯定不是罗马风且同时也不属于古代晚期的例证，或者可以分析上述或其他的重要教堂，或是企图发现所有作品中共同的显著特征——如果真的有这么大胆——然后驳斥从绘画和应用艺术中推断出来的所谓评判的准则。尽管没有明确的评价系统，但这样的尝试已经开始进行并且得到一些基本的观点。因此举例来说，前罗马风式样的内部组织已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一点可以在亚琛的礼拜堂和贝内文托的主教堂这些建筑的迷人之处得以证实（有某些罗马风建筑在空间分隔的数量上优于加洛林式的建筑，但同时它们显然是在追求清晰性和可读性）。

空间的分离与分隔表达了对复杂方法的偏爱，尤其可以从条纹状的墙面，以及在较宽或较高的区域采用深层跌落的拱券分割这些方面可清楚地看出。如同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字形分界线与隔

离线一样，盎格鲁—撒克逊教堂的不同部分之间（中厅和圣台间，中厅和横厅间，中厅和前厅门廊间）的拱券，通常并不比门宽，在这一点上，威尔特郡的阿冯布雷福德圣劳伦斯教堂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奥维耶多附近的圣胡利安·德·洛·普拉多斯教堂中，中厅与横厅之间的墙是开敞的，但可容视线穿透却无法使人穿过，亚琛的巴拉丁礼拜堂中则使用格构拱来实现更大规模的分隔。在英格兰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教堂又窄又长的内部空间已成为值得注意的典型特征，这一点在亚琛的礼拜堂中同样也是很典型的。

加洛林式建筑的特点是精致，就像O·穆勒所说的“一种可以感知到的质地”，即使在黑森的斯泰因巴赫教堂的废墟中也可以感到，建筑墙的外表面部分比其内在的石制部分更为强调。尽管在11世纪仍然如此，但墙体已经不再像洛尔施教堂的门房那样引人注目，其墙面如同是一张精细图案的网。拱顶则主要显示了前罗马风的特点：当筒形拱相互交叉或贯穿时，通常产生半抛物线形的交线，它在拱顶表面勾勒出的曲线创造了丰富的光影效果。平面与内部布置也相当不同，并不像其罗马风复本（正方形平面上相交拱券间的十字拱顶），所有这些都是精心建构的，并且大尺度的抽象形式决定了它的外观。

仅有很少量的加洛林式建筑仍保存完好，可对其结构差异进行实际的检查。越过这些去宣称能够区分加洛林建筑的各个发展阶段，充其量只是一个有趣的尝试，但我们认为只有研究了实际的形态才能作为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必须永远记住在偶尔保留下来的个别建筑与那些曾经存在的大量建筑之间存在着极度不平衡现象。看一眼由A·曼绘制的地图，其显示的已知加洛林时代的修道院将生动地证明这一点。

四、早期奥托尼昂式

前罗马风的第三个阶段被称为早期奥托尼昂时期，这些所谓的黑暗时代是从9世纪末延续到10世纪的下半叶，对此我们实际上知之甚少。此时正是以诺曼征服欧洲北部和西部地区，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统治（以及散见于意大利南部的零星入侵）以及匈牙利猛攻欧洲西南部为标志的。就像公元732年（当时查理·马特在普瓦捷建立了Saracens，企图重新统治欧洲）一样，公元955年是另一个转折点，以奥托帝国在莱希战役中大胜匈牙利为标志，然而这仅是重新统一帝国的开始，但在

艺术上却有着明显深远的影响。奥托尼昂当权于公元919—1024年间，但在其统治的第一个世纪的上半叶，大约公元960年或970年统治着东部帝国。就艺术史而言这是一段空白，同加洛林时代终结期类似，因为它也属于黑暗时代。9世纪晚期到10世纪前60年期间残留的建筑相对稀少，仅有的例外是一小组位于西班牙中北部和葡萄牙洛罗萨的摩萨拉布式教堂（9世纪后建在阿拉伯统治的西班牙的基督教堂建筑式样）——例如贝尔兰加、马佐特、勒贝纳、梅尔奎、塞拉诺瓦、佩尼亚尔瓦、圣米良·德·拉科戈利亚等处的教堂。

五、研究的情况：发掘与调研

同对待古代建筑一样，为了成功地研究中世纪或晚期中世纪艺术，对前罗马风建筑的研究，要求我们对现有的知识来源进行严格的分析。

首先要记住的一点是，保留至今的加洛林式建筑或奥托尼昂式建筑几乎都经过改建。基本上全部或部分保留原始情形的教堂数量也很少，这不仅同12世纪（同哥特式无关）难以估量的建筑财富无法相比，也无法同已经存在过的建筑相比。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研究学者们已经努力了一个多世纪来扩展这方面的知识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越来越多的小型 and 尺度适中的建筑上，以及其他的——大型且重要的建筑（被忽视或彻底忽略）。甚至在11世纪也是如此：例如尼韦勒的圣格特鲁德学院教堂。具有默兹山谷全部早期罗马风建筑的特点，却还是仅在近几十年才被人注意到。像发生在尼韦勒的事一样，伴随着复原传统地段经常有重大发现。因而认识的增加主要通过调研那些仅残存部分的建筑物，无论是在废墟中还是被大部改建过的。这种彻底的研究通常耗费大量的劳动力、时间和精力。甚至在研究一个现存建筑时，也要搭施工架，而这些通常只有当新建或复原工作也同时进行，以及当有可能复原出原建筑时才能进行。发掘则问题更大。很多时候由于外部以及经费原因，两种形式的调研会由于时间和范围而受阻。因此对新知识领域的认识也都是支离破碎的。但调研目的本身就带有很多限制，因为无论是最伟大的创造力还是最优秀的发掘工艺都不可能成功地让已经消失的东西重新出现。从这样的材料中得出的推论经常是错误的，对结果理解性的偏差很容易导致假说和不恰当的推论。假说在考古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学术研究者必须认识到

也将面临大量的假说。复原图对于著书或是得到大众的承认是有说服力的，尽管证明经常会变得过时，却很难被否定。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发掘，其结果都只不过是一些平面——如果幸运会发现一个完整的平面，若更加幸运，也许还保留着一个大门，一个柱基，一个雕像基座或一段墙的基础，但通常是从残缺的平面来估计上层结构和立面。从相似建筑中推断出来的形式逻辑相似点，充其量只能是假说。由此企图进行的任何修复和重建都应格外谨慎。我们在这些篇章中的介绍主要基于仍保存的建筑，尽管它们数量很少。如果把范围扩展得再广一些，还包括那些发掘中已知基础保存完好的建筑，或其他在后来重建过程中，没有被改动而保留下来的部分。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最近的考古学发现，必须一直保持严格的客观态度。

然而就我们所知，从考古学调研的基本点出发，比假说和复原个别建筑有限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发掘可提供一睹某个特定区域内建筑建造年代顺序的机会。在考古技术中值得注意的改进，就是可以知道岩层的年代顺序。今天的发掘者首要关心的不再仅是使墙基暴露出来：为了在这些非常复杂的发现中引进某种程度的确定因素，小心地观察从表面到最下层的岩层的连续性已经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掌握这些层化图表，我们必须调查发掘现场，然而仅有专家才能充分了解整个外部过程，而实际上也仅有那些涉及了所有细节的人才能了解。很多情况下，技术为我们显示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过程，从异教的罗马神庙、经过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教堂到哥特甚至更晚的建筑。通常可以看到一个清楚发展的顺序：即基础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甚至可由此确定相对的年代。确定绝对年代一直是一个特殊问题，用很多方法可解决：通过文字记录或通过发掘地点出土的陶器和钱币，通过绘画和雕塑的遗迹，最后还可通过相关建筑的比较。

最近几年，有很多关于中世纪考古的学术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前就没有。相反本世纪每十年就有新的令人鼓舞的调查发现。不仅仅是因二战的毁坏才为建筑研究开通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战后很多欧洲国家的经济复苏也为此提供了机会。由于受正统的和地方的罗马考古学研究以及史前研究的鼓舞，早期中世纪建筑的研究人员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以上所提到的倾向和基督教考古学以及艺术史之间长期存在的有害阻碍大体上已经不存在了。随着日渐扩展的技术智力水平，方

法与发现上的更大的改变也是有其原因的。必须记住在一战以后,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英格兰甚至荷兰,对德国研究学者的研究而言仍然是绝对的边远地区。同样,帝国版图内奥托尼昂式建筑对于法国和意大利来说基本上也是未知地域。因而可以理解在艺术上,“民族式样”是如何有最早的雏形。在法国被称作“le premier art roman”以及奥托尼昂式建筑的问题,同自然条件与地界条件有关,仅在现在才被清楚地理解。

就同等意义而言,也为加深和拓宽我们的客观知识,无可否认即使是最全面和成功的发掘也不能为我们挽回已经长期消失的建筑。内部也是一样——原始的高度比例、门与窗、支撑物、拱券的式样、组织的细节,这一切只能根据平面加以想像。某些东西可由分析得出,但那也不是真实的,只是预先假定一个理想的发掘,一旦出现外部平面和所有同基础有关的本质部分,都至少可以修正出其带有某种确定性的年代,简言之,很少有例外。

尽管有很多隐藏和怀疑,至少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掌握了大量重要教堂的主要特征。曾几何时,科隆、希尔德斯海姆、哈尔伯施塔特和兰斯等地大量兴建的加洛林式大教堂并不能消散我们心中含糊的阴影,更不要说全面地了解,但今天我们已为其精确的样式所打动。在埃森、尼韦勒、洛尔施、科尔韦和圣丹尼斯的加洛林式修道院,以及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和洛桑的奥托尼昂式大教堂,还有克吕尼(以克吕尼二世教堂闻名)、弗雷登和上考丰根的修道院教堂也是如此。

在埃斯林根和雷根斯堡的下明斯特修女院教堂的发掘,显示了像西伯利亚等区域的加洛林式和奥托尼昂式建筑,它们是从更早的中世纪考古学中推断出来的,或者说像多瑙河地区一样,是通过并不十分先进的研究方法得出的。在威斯特法利亚和下萨克森有大量意料之外的完整发现。荷兰、比利时、瑞士和奥地利已经扩展了新的领域,不仅包括大的教堂——那些追随着亚琛的巴拉丁礼拜堂而建的一些建筑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而且还包括一些相当数量的小型建筑。为此,不同结构和形式的罗马风建筑发展的问题不得不再次公开化。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基本的决定性问题依然没有答案。科隆的加洛林式大教堂的建设史(发掘工作由O·多普勒费尔德进行,曾引起轰动),仍是有待讨论的课题,并且其建筑式样经历过不同时期却仍无法得到充分

的解释。对于B·奥特曼和H·蒂姆勒主持进行发掘的帕德博恩的阿丁霍夫修道院教堂,无论是加洛林式还是奥托尼昂式,其年代仍然是不能确定的。此外,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奥托统治时期建立在马格德堡的大教堂的不同部分,但它们如何能精确无误地安置在一起至今仍是一个谜。

最近的发现为解决问题带来了光明。重建上莱茵地区奥托尼昂式大教堂的设想已被接受,并毫无疑问地出版在艺术史手册中。但所有事情都必须再次考虑,那些在富尔达和圣加伦的大型加洛林式教堂也应如此。我们表面上不容置辩的知识其实是如此令人惊讶,以至于把那些黑森的卡塞尔附近巴特黑斯费尔德修道院教堂的废墟当成范本。当D·格罗斯曼敢于宣称这个现存的建筑是属于加洛林式时,他走出了勇敢的一步,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属于11世纪。他宣称的观点是绝对可信的,所引发的学术讨论也导致了具体的行动:H·费尔特克勒,G·宾和D·冯·温特菲尔德进行了新的发掘,发现了现存教堂废墟旁的一座加洛林教堂的基础。

十年来,教堂西前庭与其他相关的形式——如横向的西立面和三塔的西立面,室外地下室以及圆形的唱诗席——仅在近几年才被组织成尽量完美的建筑形式,其结果使我们对早期中世纪建筑的了解有了进一步的改变。

出于另一方面的考虑,大量的发掘也导致了新视点的产生。很多情况下在同一地点,以前有一幢或更多幢建筑——更早发现的教堂——这被认为是在特殊的研究领域中,留给那些研究教堂历史专家的最好礼物。现在对于很多重要的教堂,已通过追溯到罗马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建筑例子来得到直接的证明。现在可以看到,那些重要的大教堂和大型修道院教堂是如何从一些小的型式发展起来的,一个“Cella memoriae”(在一块基地上的一种小型还愿礼拜堂)又是如何不断地被重建加大和扩展,最终形成一座大型的加洛林式或奥托尼昂式教堂。首例如在克桑滕和波恩的莱茵河地区成型,然后又出现在科隆的圣泽韦林教堂。很多实例中殉道者的墓地依然保存完好,尽管经历了无数重建和改变,依然残存的早期建筑的岩层还有如此之多且可被辨认,真是令人震惊。在另一些情况下,出发点则是罗马神庙,例如荷兰的埃尔斯特教堂;或是一种小型单厅的墨洛温王朝式教堂,如比利时的尼韦勒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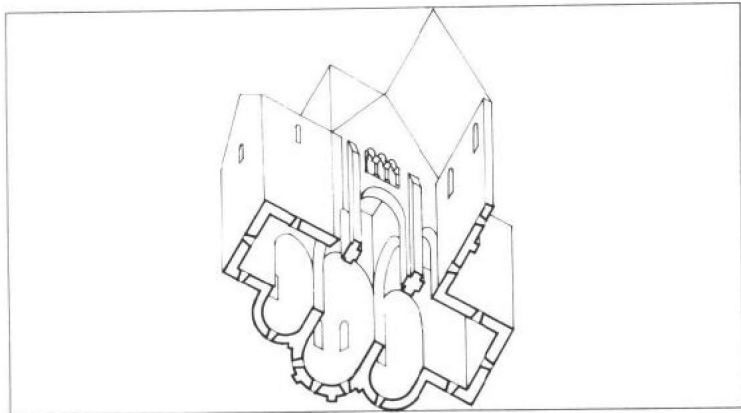


图1 默讷, 教堂轴测图 (摘自 Le-sueur, 196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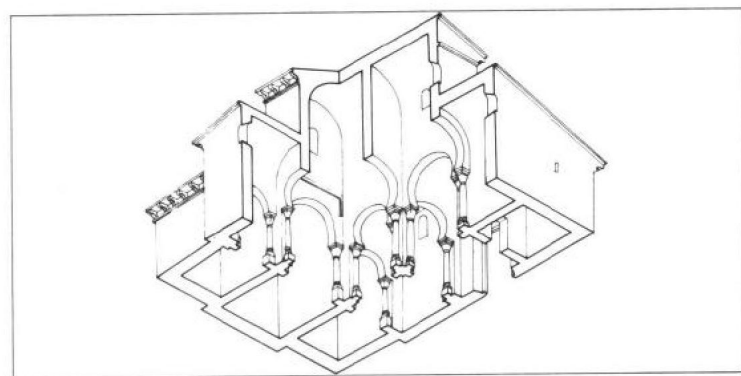


图2 勒贝纳, 圣玛丽亚教堂, 轴测图 (摘自 Conant, 195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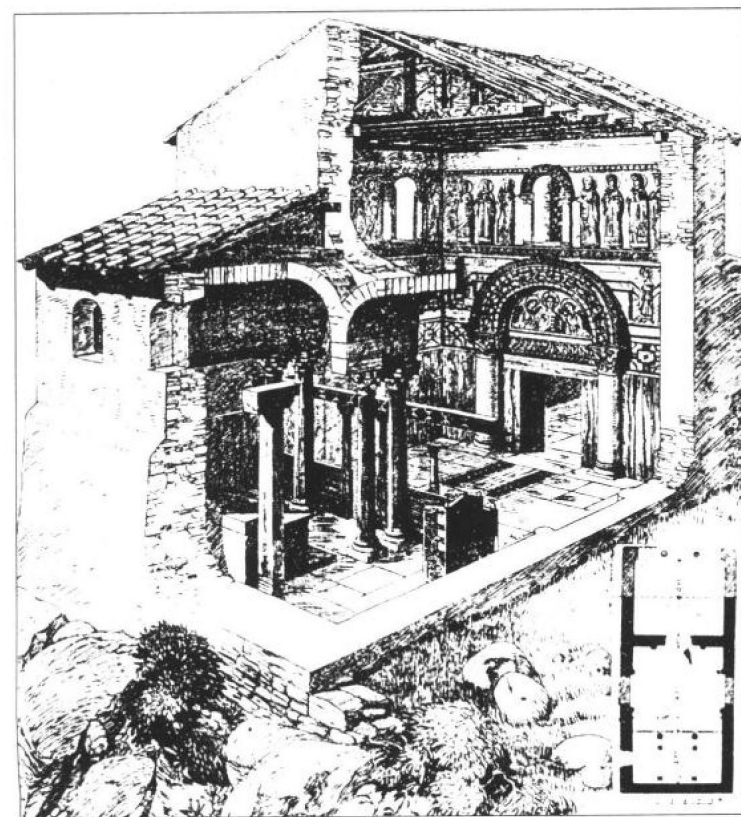


图3 弗留利地区奇维达莱, 瓦莱的圣玛丽亚教堂礼拜堂, 内部及平面图 (摘自 Haupt, 1909 年)

堂。一座发展到相当规模并经历过中世纪数次改变而保存下来的罗马早期基督教堂实例是少见的,例如维罗纳的圣斯特凡诺教堂、米兰的圣辛普利西阿诺教堂、或是法国罗讷河畔维埃纳的圣皮埃尔教堂。在特里尔, J·K·肯普夫不仅证明,在历史上找到了传说中的海伦娜皇后大教堂确有其事,而且他也综合加深了几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著名建筑的研究成果。康斯坦丁统治时期(公元306—312年在位)特里尔的集中式平面教堂中厅的特征经历了中世纪的漫长岁月终于保存下来,另一方面,维罗纳、米兰和维埃纳等处的教堂,由于中世纪的修缮,必然也会隐匿一些东西。因此,有关古代建筑同中世纪建筑之间关联性问题的争论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六、单厅式教堂

仅在最近,无廊式教堂——圣台连着单独的中厅——通常为方便而用一个德语词“Saalkirche”来指代的形式——已被鉴定为一种独立的建筑形式。作为二战后进行扩展发掘的结果,“Cella”被认为是早期基督教堂的基本形式之一,历史证明,在很多地区我们发现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都是一些纪念性的、用于殡葬的小型礼拜堂即“Coemeteria”。通常由此发展出更大、更复杂的建筑,偶尔只在原来建筑的旧址上新建建筑。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前罗马风教堂与罗马风教堂都是由这样一些“细胞”组合而成。记住这些组合法则相当重要:事实上,罗马风建筑是以空间元素和体块的严格对称以及清晰的秩序为基础的,绝不会是像在古代近东建筑或是在米诺时代的Gretan皇宫所看到的那种无组织的聚集。

在欧洲发现很多前罗马风和罗马风时代的礼拜堂中单厅教堂的室内实例,通常东端都带半圆形后殿,长方形唱诗席或是附加一个塔。早期的结构当然不同于盛期时的同样形制的罗马风建筑实例:不同的内部组成并不就是决定性地划分了界线(例如它们可能都有相同的宽度),若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之间只有通过狭窄的像门一样的开洞才可以既相互隔离又相互联系。

有几个这样的建筑完整或部分地保留了下来,但二战以来,通过在很多地方进行的发掘,我们已经了解到很多有关单厅式教堂的情况,以前仅从早期记载中得知的建筑纪念物已经显露在我们眼前。这样,在考

图 4 埃斯科姆, 圣约翰传道者教堂,
内部空间图(摘自 Brown, 1925
年)

图 5 阿冯布雷福德, 圣劳伦斯教堂,
从东北方向看外观(摘自
Brown, 19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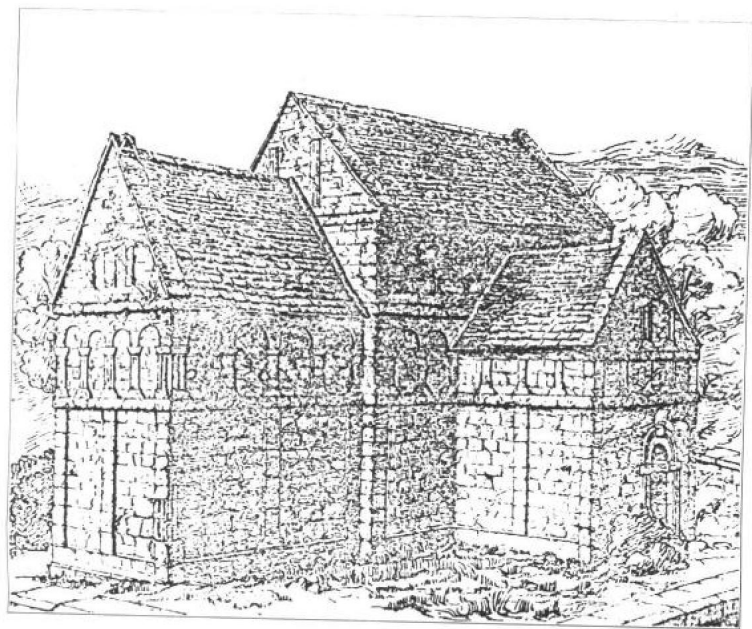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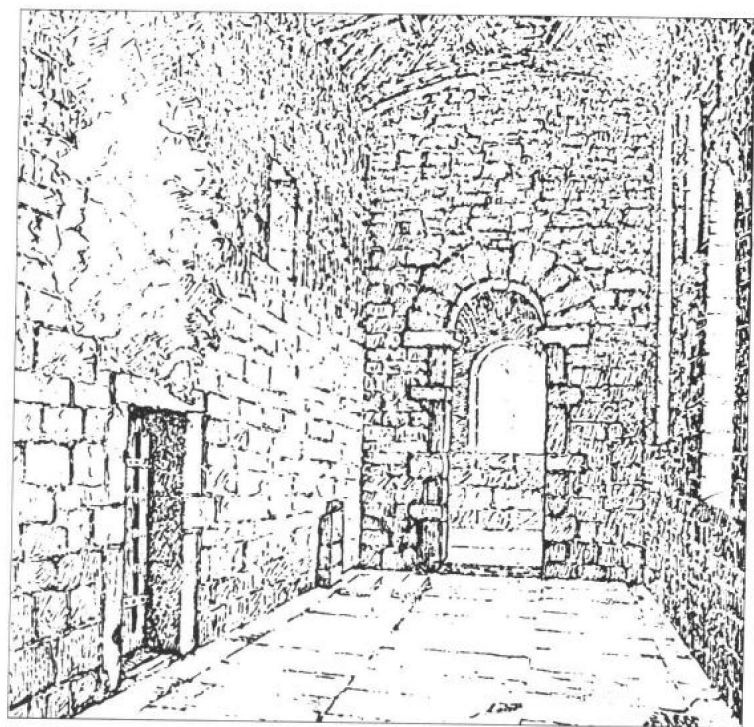


图 6 米施泰尔, 圣约翰修道院教堂,
教堂东端半圆形殿外观

图 7 格伦达洛河谷, 圣凯文礼拜堂,
平面、剖面 and 立面(摘自
Brown, 19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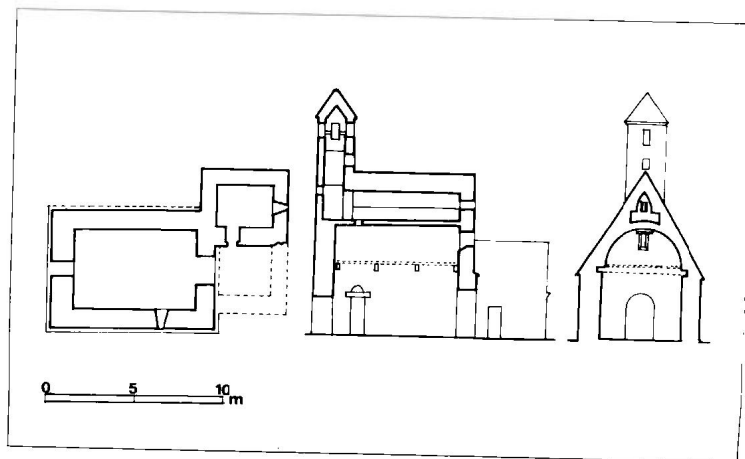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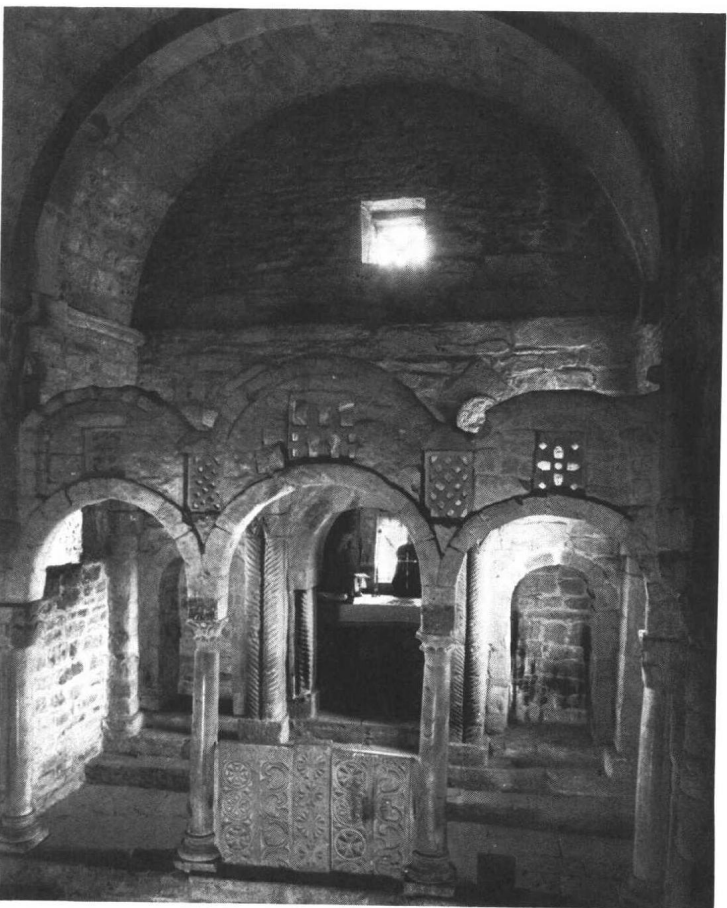




图 8 圣佩德罗·德·勒·内夫教堂，向东看室内

图 9 圣克里斯蒂纳·德·莱尼亚教堂，向东看室内



古地图上曾是空白的地区找到了一些早期教堂，并为我们带来了具体实物。例如在莱茵河下游和默兹山谷发掘出一个前罗马风单厅教堂的完整基础和一些早期罗马风教堂，它仅剩一小部分还耸立或者说是处在一种还可以根据墙体遗迹来重建的状态。对此应特别感谢 W·巴德、G·宾、H·博格、L·热尼科和 J·梅尔滕斯等。由 L·克劳森、F·埃斯特许斯、H·蒂姆勒和 W·温克尔曼在威斯特法利亚进行的发掘与研究成果显著。在西伯利亚，由 G·费林格尔和他的助手及 B·西齐进行的发掘——在布伦茨的早期木构教堂所在地发现了特别令人感兴趣的结果——已经显露出古老的岩层；在上巴伐利亚也有一些发掘取得了初步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慕尼黑附近的穆哈塔尔和在雷根斯堡的下明斯特修女院教堂（古老的大礼拜堂）。

我们现在知道很早就有了相当规模的单厅教堂，而并不是首次出现在 13 世纪意大利托钵僧制度所建的教堂中。实例说明：早期基督教时代就已有米兰的圣辛普利西阿诺教堂和圣纳扎罗·马焦尔教堂以及维罗纳的圣斯特凡诺教堂这样的教堂，且这三个教堂几乎都保存完好；而墨洛温王朝时期就有了梅斯的圣皮埃尔·奥·诺南教堂，但仅有部分保存；加洛林时期则有科隆的圣庞塔莱翁教堂、索斯特的圣帕特罗克吕斯修道院教堂、奥尔良内地区的默讷教堂以及普瓦图地区的圣热内罗教堂。已知的许多巨大尺度罗马风无廊式教堂大都带有完整的筒形拱顶、穹窿或十字拱顶（以上全部在欧洲西南部），特别是在意大利采用开敞式的桁架屋顶。

带附属建筑的单厅教堂也很常见，以上实例中的几个教堂东端就有对称的附属物。作为一项原则，这样的附属物成对出现在横厅两端，外部为标志性的相交鞍状屋顶，内部则在主要区域连接以拱券，其结果就产生了类似于拉丁十字的平面，例如科莫省圣阿邦迪奥教堂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结构以及瑞士最早的两个“Romainmotier”。

附属建筑是通过更偶然的机会同教堂连接起来的。黑森的兰河畔戴特科兴的前学院教堂的最早结构似乎已有了这样的附属物——由于屋顶不同高——因此同教堂内部其他部分就没有任何联系。在那些无内廊的教堂中，我们所知的仅是通过发掘的基础推断出的部分，如施派尔的圣杰曼教堂，但无法确定它们的基础平面对称的。我们已有自加洛林时代起的很多实例，成列的附属物连接在教堂的一侧，例如瑞

士格劳宾登的米施泰尔的前修道院教堂。附属物也对称地联接在教堂的两侧，这在大量的盎格鲁—撒克逊教堂中可被证实，值得注意的有肯特郡（瑞卡弗已毁坏的修道院教堂，和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中的圣潘克拉斯教堂遗迹）。除此之外在某些无廊教堂中，会在三边或四边都带一些更小且通常更低的附属结构，包括普瓦捷的圣让浸礼堂的墨洛温式洗礼堂；一些西班牙的西哥德式教堂，例如萨莫拉省的圣佩德罗·德勒·内夫教堂和奥维耶多的圣克里斯蒂纳·德·莱尼亚大教堂，后者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800年左右；还有在伦巴第瓦雷泽省卡斯泰尔塞普里奥的圣玛丽亚·波塔姆教堂。同样值得提及的是，最终无廊式教堂的主体被3—4边的成列附属结构所围绕，从外部看这种布局可使人对侧面中厅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在内部它们仅通过门相连。

一种所谓塔式中厅教堂的特殊形式，仅由一个圣台，中厅和塔组成。塔的首层只有一个方形的主要房间，而圣餐台部分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屋顶较低的附属建筑。这是圣餐台上方双塔覆盖的塔式唱诗席教堂的一个颠倒——一种罗马风时期广泛流行的样式，但其起源地不能完全确定。塔式中厅教堂主要出现在西班牙的摩萨拉布地区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地区。

一种发展的替换形式是东端带三个相连的半圆形后殿。保存最好的实例是瑞士格劳宾登的米施泰尔的圣彼得教堂：三个并置的细长半圆形后殿，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它属于格劳宾登的这样一批建筑——如米施泰尔的圣约翰修道院教堂，迪森蒂斯的本笃会修道院教堂——在其临近地区，如值得注意的马来斯·韦诺斯塔的教堂就跨越了意大利国界。这种形式本身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已有其前身——例如弗留利地区奇维达莱——那里依然同地中海东部国家存在着联系。它没有因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而受到限制，因为在北方如莱茵河北部地区韦尔登已毁坏的圣克莱蒙斯教堂和荷兰的奥斯特贝克也发现了它的存在（仅剩下基础）。

这种无廊式教堂对于理解前罗马风建筑，在某些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而且唯一的作用。公元711年伊斯兰教入侵以前，西班牙很少有保存下来的西哥德式的教堂，保留下来也都是些小型的，大部分都没有内廊，有时是十字形平面，石块经过细心的切割和砌筑。值得注意的是在

十字交叉处建塔楼的发展趋势，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十字形相交平面的想法（这一点将在下面我们讨论巴西利卡东端布置中看到）。然而它们中没有一个是自我围合、界限分明、且壁柱的四个相同拱券整齐相交的，这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解决办法。然而尽管中央区域通过柱子得以强调，它们却是不对称设置的。

爱尔兰早期的教堂几乎都是单厅，由采石场开采的石头砌成且不用砂浆，采用承梁拱上支持尖筒形拱顶并且直接覆盖以陡峭的石板屋面。纵墙通常伸出前墙产生一种类似触角的突起物。整个构想是独一无二的，但耸立在附近圆形且非常纤细的塔在这种由单一元素组成的教堂中被完全忽略了，格伦达洛河谷的礼拜堂或多或少可作为一个典型实例。

这种情形在英格兰再次出现。作为西方基督教的另一世界，不计其数的大教堂在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时代建立——从5世纪起直到1066年，诺曼人的入侵实际上结束了整个时期的修建热潮。没有一个大建筑保存下来是因为在11和12世纪期间，国家新的统治者毁掉了所有旧建筑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自己的教堂；它们中的很多被覆盖或代之以哥特式样重建。从文字记载和少量的发掘中可以发现无论怎样模仿那些欧洲大陆上的建筑，大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教堂都有它们自己的特征。遗憾的是这仅在较小的寺院建筑和地方牧区教堂中得到证实，尽管没有多少保存完整的。然而英国研究学者已宣称揭示出大约超过400处教堂废墟遗迹，以显示经历同样长时间后，艺术分支的高度分离：例如在蒙克威尔茅斯的圣彼得修道院教堂的塔，这种保守性——也是其他英国特征中的突出特性——使得确定年代相当困难，对同一个特殊教堂的年代鉴定结果可能会相差几个世纪。

几乎所有这些教堂都是令人吃惊的狭窄和陡峭，内部就像深深的竖井，如在埃斯科姆的圣约翰传道者教堂所见。中厅和圣台区之间，以及中厅和横厅之间，通常高而窄的拱券使人感到与其说是连接券洞不如说是分隔彼此区域的门。这让我们回忆起一些欧洲大陆的现象，如它们强调隔离的十字交叉处或是加洛林无廊式教堂的附属物。

七、教堂西前庭

作为加洛林时代的一种建筑创造，教堂西前庭（教堂的西端部及其